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苗学辑

中国 苗学

石朝江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苗学辑

中国苗学

石朝江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爱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于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9 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 60 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14 年，第 24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召开，我社在已出版《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的基础上，遴选出两辑 15 册，作为“书博会”的献礼。

本辑为“苗学辑”，共 10 册。

出版前言

苗族，就其人口数量言，是中国第五大民族，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苗族有 894 万人。苗族同时又是一个分布世界的民族：在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有 200 多万人，美国有 30 万人，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共有 5 万人。苗族还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距今五六千年前，苗族先祖蚩尤就同华夏族领袖黄帝、炎帝逐鹿中原并称为中华文明三祖。千百年来，苗族因战乱所迫，迁徙无恒，最终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才找到生存之地。现今贵州的苗族有 400 多万人，约占全国苗族人口的一半。贵州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族也是贵州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

研究苗族和苗族文化的学问叫“苗学”，古代贵州的“苗学”文字，大多来源于地方官员，如李宗昉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田雯的《黔书》、胡宗绪的《苗疆记事》、龚柴的《苗民考》、贝青乔的《苗俗记》、徐家干的《苗疆闻见录》等。最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有清代组织的《百苗图》编绘。但上述著述大多立场偏颇，观念“正统”，又只是为“王政”或“战事”服务，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的“学（-ology）”。

运用现代学科方法而发轫的“贵州苗学”著作，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早期人类学家，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等人大量的调查报告，还有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

告》。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19世纪最后十几年至20世纪最初的20年，可以将它们看作是“贵州苗学”形成的初期阶段。换句话说，“贵州苗学”研究始于西风东渐。这使得“贵州苗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的视野。之后出现的《贵州苗族考》（1929，杨万选著）可以看作是贵州苗学研究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抗日战争，大批大学教授和学者内迁贵州，从而促成贵州苗学研究的高潮。这一期间，贵州苗学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水平学者带领下的有组织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活动；二是苗族群体中出现的学者提供了“自述”的视角与研究。当年，闻一多等名教授带领的西南联大学生在贵州境内的采风；大夏大学成立了由名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徽等领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编辑了有关贵州少数民族方面的专门刊物：《大夏大学民族学论文集》、《苗夷研究丛刊》，出版发行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新谣》、《贵州苗族概论》等著作。这一时期，苗族学者已初露锋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梁聚五氏，其著有《苗夷民族发展史》；若杨汉先氏，则著有《大花苗迁入乌撒考》等；王建明氏，撰有《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等文；王建光氏，撰有《苗民的文字》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至60年代，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教育院校。我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也为配合民族自治、民族识别等工作，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为贵州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编印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苗族简史简志》；各民族自治的地方也编写了相关概况。大量调查中的“采风”作品也都收入《民间文学资料》得以编印流通。这一阶段，贵州苗学研究最大特色是“政府行为”——由政府组织得以实施。

“文革”期间，贵州苗学研究和其他任何社会科学一样，沦为空白。虽然，此期仍不乏罕见成果，如台江农民王安江为搜集苗族古歌的艰苦努力——他从1968年开始，行乞为命，周游各地，徒步跋涉

数万里，收集整理了完整的《苗族古歌》，至今仍然是值得为之赞叹的壮举。

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文革”造成的十年空白之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重建取得了丰硕成果，贵州苗学研究也成果斐然。这期间，主要的苗学研究著作有：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杨庭硕的《百苗图研究》，翁家烈的《苗族文化论》，麻勇斌的《神性妇女研究》，杨培德的《鼓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罗庭华、余岛的《贵州苗族文化教育研究》，徐新建的《苗疆考察记》，石朝江的《中国苗学》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自苗族内外，也来自海内外。相关的涉及苗族的研究，在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的各种视角下，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入 21 世纪以后，除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势头，苗学研究进入到“整合”阶段，有了大部头的《苗族通史》的面世，《20 世纪苗学研究百部文库》首次出版第一辑便有 10 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也由英、苗、汉学者共同完成；首部集可视、可听、可读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也由本社出版。贵州苗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本丛书第一辑将目光集中在过去百余年来贵州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努力保留各个时期的阶段性代表作品。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重要著作之一，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一直未能译成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找出原书并组织了翻译；曾被称为“苗族救星”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写过《苗族纪实》，另一英国传教士克拉克著有《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此二书现合并刊行；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在 1936 年曾经刊行，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代表作品此次亦作再版。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末，是苗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此期间我国重要民族学者的著作中，我们选了杨万选著的《贵州苗族考》（1929）与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人的文章合为一册；苗

族学者梁聚五著的《苗夷民族发展史》则更名为《苗族发展史》独立成册。

50年代至60年代，因贵州民族出版社曾出有大量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我们仅选载了著名学者费孝通“劳动的苗家”与中央民族调查团的一份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合为一册，用以反映当时的调查观点和调查方法。

80至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苗学研究恢复发展的时期。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和石朝江的《中国苗学》，也是此时期成果丰硕的苗学研究的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苗学研究日趋繁荣。考虑到苗学研究的这一现状，我们选择了美国学者路易莎和台湾学者简美玲的新著，以期读者能够了解海外贵州苗学研究的趋势和前列学者的成果。

区区十册，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贵州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原宥。作为贵州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和成果最多的部分，“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刊行的是“苗学研究”的部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贵州苗学研究各个时期的特征和认识水平，除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谓作了删改外，尽可能保留原著原貌。另外，有些文章的著作权人一时未能联系上，为其大作早日出版，泽惠学林，不得已只好先行采用。我们恳请原作者或著作权继承者海涵原谅，并请与本社联系。

出版者

序

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大本营，贵州也应该是苗族研究的大本营。18 世纪下半叶以来，贵州苗学从“潜流”（未有苗学研究之名但已有苗学研究的著作）变为“洪流”（20 世纪 80 年代为“苗学”立名并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也与“藏学”一样正在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显学。”不管怎么说，贵州苗学从来就是贵州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

贵州有许多优秀的苗族学者和苗学研究著作，也有许多优秀的国际学者研究贵州苗学。这是贵州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贵州文化建设的一笔重要财富。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苗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贵州苗学重要著作的集成放在其向贵州建省 600 周年献礼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出版，感到可喜可贺。出版社同志嘱我作序，千言万语无从下笔，写下几句感言，是为序。

王朝安

（原贵州省省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苗族）

按：本书是从宏观“学”的层面第一本研究中国苗学的专著。初步形成了苗学这一学科的基本框架，首次出版于1999年。作者石朝江，苗族，现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贵州省苗学会常务副会长、贵州省民族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民族文化和哲学社会思想研究，另著有《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苗学通论》、《苗族文化研究》（合著）等。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苗学是一门以苗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2
第二节 苗学研究的任务和意义.....	4
第三节 苗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6
第四节 苗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0
第五节 走向 21 世纪的苗学研究.....	13
第一章 “人的启示”：苗族历史.....	16
第一节 苗族早期历史概述.....	17
第二节 苗族历史上的五次迁徙波.....	26
第三节 苗族历史上的三次大起义.....	38
第四节 民国军阀对苗族人民的镇压与屠杀.....	53
第二章 “民以食为天”：苗族经济.....	58
第一节 苗族的经济生产活动.....	59
第二节 食物分配与交换.....	67
第三节 苗族的消费观念.....	70

第三章 社会的传承与整合：苗族政治组织..... 75

第一节 部落、部落联盟..... 76

第二节 鼓社..... 80

第三节 议榔..... 86

第四节 理老..... 89

第四章 战争艺术：苗族军事思想..... 93

第一节 军事民主主义思想..... 94

第二节 乾嘉苗民起义的军事思想..... 99

第三节 张秀眉的军事思想..... 106

第五章 群体行为的规范：苗族习惯法..... 117

第一节 苗族习惯法规则..... 118

第二节 苗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与演变..... 131

第三节 苗族习惯法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133

第六章 交际工具与符号系统：苗族语言..... 137

第一节 苗族语言概况..... 138

第二节 苗语语音、词汇、语法..... 141

第七章 民族进步的阶梯：苗族文字..... 153

第一节 表形文字..... 154

第二节 篆字体文字..... 156

第三节 湘西方块文字..... 158

第四节 石门坎文字..... 161

第五节 三种方言四种文字	162
第八章 文化濡化：苗族教育	165
第一节 苗族传统的乡村教育	166
第二节 学校的汉语文教育	168
第三节 石门坎——20 世纪初叶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172
第九章 语言艺术：苗族文学	175
第一节 苗族民间口头文学	176
第二节 苗族作家书面文学	185
第三节 苗族当代文学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197
第十章 智慧的曙光：苗族哲学思想	202
第一节 苗族早期唯物主义思想萌芽	203
第二节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210
第三节 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	219
第四节 苗族生成哲学	223
第十一章 超自然存在物与超自然力量：苗族宗教信仰	236
第一节 苗族的崇拜对象	237
第二节 苗族巫师与巫术	247
第三节 天主教、基督教在苗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254

第十二章 风俗的统治：苗族伦理道德	262
第一节 苗族的伦理观念与道德规范	263
第二节 苗族伦理道德的特征与社会功能	267
第十三章 民族精神：苗族心理素质	272
第一节 苗族心理素质的特征	273
第二节 苗族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	282
第十四章 美的旋律：苗族音乐与舞蹈	285
第一节 苗族音乐	286
第二节 苗族舞蹈	292
第十五章 生活摇篮：苗族家庭	301
第一节 母系大家庭	302
第二节 父系大家庭	306
第三节 个体家庭	309
第四节 当代苗族家庭发展的新趋势	314
第十六章 竞技艺术：苗族体育	317
第一节 绚丽多姿的苗族体育	318
第二节 苗族传统体育的社会文化价值	321
第十七章 生命的护符：苗族医药	328
第一节 苗族医药的起源与发展	329
第二节 对疾病的认识	332

第三节	诊断与治疗	336
第四节	苗族药物	341
第五节	发展苗族医药	343
第十八章 新生产力：苗族历法与科学技术		345
第一节	苗族历法	346
第二节	冶炼	352
第三节	工艺	355
第四节	农林牧科学技术	361
第十九章 适应与冲突：苗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		370
第一节	苗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371
第二节	苗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	374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	376

绪论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强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建设,充实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并强调要“扶植新兴、边缘学科的成长”。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一门以苗族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学科——苗学,已经建立起来了。

第一节 苗学是一门以苗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苗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苗族的学问，是以苗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苗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又是一个人口较多、欣欣向荣的民族。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我国苗族人口893万人，仅次于汉、壮、满、回四个民族，居全国第五位。苗族人口中的一半（430万）居住在贵州，在云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广西、陕西、海南、北京等省、市、区都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另外，还有200万苗族散居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圭亚那（法属）等五大洲的10多个国家。苗族还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

对苗族的调查与研究，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苗族名称初见的宋代，宋人朱熹的《记三苗》，最早提出了当时湖南一带苗族可能是古代三苗遗裔的看法。在这之前，历史文献有关苗族先民的资料不少，但均为记录性质，谈不上研究。在国外，至迟也始于1688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德·马盖兰斯于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来华，游历过我国各主要苗族地区，1688年著《中国新纪实》，书中对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的苗族均有记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但苗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提出来，却是1988年的事。1988年11月，我国苗族主要聚居地的贵州省，在黄平县召开了贵州省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230多名苗族及各族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出版了《苗学研究》，创办了《苗学研究通讯》。“苗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始见于国内各主要报刊。198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苗学：一门世界性学科》的专论，受到海内外苗学专家的重视。之后，湖南、云南、四川、重庆、广西、海南、北京等省市区也先后建立了苗学研究会。贵州省苗学研究会相继组成八个学科组开展活动。各地州、市及有苗族聚居的县都相继建立了苗学研究会作为贵州省苗学研究会的团体会员。在会员中，有各种专家、学者和有志于苗学研究的实际工作者。对苗族展开了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

正如任何一门新兴学科都会引起人们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样，现在社会上对苗学是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仍有争议，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门学科从产生到人们的普遍承认，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我国的考古学，是